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个人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性

——李海伦编《中国音乐人生》评述

文◎宫宏宇

自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大陆后，国内学界从一开始的对此学科中文译名、学科界定、审视范畴、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注重，到当今如何建立"中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等问题的讨论，其焦点大多不在音乐活动中的个人。现今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独占鳌头的"仪式音乐"更是以族群的集体音乐(有些甚至是与音乐无关的)行为为主。从原先主要为音乐创作总结规律并提供素材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到现在全方位透视音乐作为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兴起无疑代表着一个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化，其促进此学科发展繁盛之功自不可也不应低估。但其结果却并非完全可恭可贺，客观来讲，应是一柄双刃剑。其正面的结果是民族音乐学学科自主意识的深化和研究切入点的多元化，但其负面的效果是对创作音乐的人和音乐本身的疏忽。国外的研究虽然多样化一些，但关于音乐家自身的研究却也不多见。针对这种现象，布鲁诺·纳特尔(Bruno Nettl)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恳请学者注意"个人"的因素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见《民族音乐学研究—29 个问题与概念》，美国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83)。无独有偶，郭乃安先生也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发表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一文(载《中国音乐学》1991 年第 2 期)，表示了他对音乐学研究离"人"越来越远现象的隐忧。针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离音乐越来越远的现象，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音乐伦理学与美学研究的展艾伦（Alan R. Thrasher）从 80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曲牌"。他的近著《中国南方的丝竹乐》(Leiden & Boston: Brill, 2008)就是例证。

如果说现居加拿大的已退休的展艾伦的研究所关注的是中国音乐形态问题的话，旅美英籍学者李海伦编的《中国音乐人生》则旨在重申"个人"在音乐学及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与我们常见的"生平与创作"、"评传"类做法不同，此书中的作者在方法上和选材上均各有自己的偏好。正文七章，有从民族音乐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描述传主的人生阅历与时代变迁，也有用传统的以文本为主的方法来评述传主的生平业绩；有用口述历史的方法通过传主的原话来展现乐苑往事，也有类似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那样恭敬地记录其师的言行；也有以聚焦人物的方式对全球化语境

下诸种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透视。从地域的涵括及传主的遴选上，书中的七篇论文也各有特色。从山青水秀的江南到大漠边关的内蒙古和新疆，从中西文化汇聚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到英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出发点之一的港口城市利物浦。所囊括的音乐家不仅有活跃在江浙乡间的草根山歌手赵永明（1920—2000），也有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沪剧明星邵滨孙（1919—2007）；有生在浙江吴兴、但日后移居上海和香港的文人女琴家蔡德允（1905—2007），也有历经劫难，但始终留在大陆的音乐学泰斗杨荫浏（1899—1984）；有 70 年代移居英国后才在业余时间参加粤剧排演的香港移民廖丽霞（1951—），也有享誉新疆的木卡姆民间艺人阿布杜拉和走红海内外的蒙古族流行歌手腾格尔（1960—）。

此书各章作者的选择也显示了编者的用心，荣鸿曾、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施祥生（Jonathan P. J. Stock）、李忠顺（Tong Soon Lee）、瑞切尔·哈里斯（Rachel Harris）、巴然诺维齐（Nimrod Baranovitch）和米思奇（Peter Micic）均是目前在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编者在内，此书的八位作者中有四位与美国匹兹堡大学有关，荣鸿曾为匹大教授多年，李海伦、巴然诺维齐和李忠顺则是匹大上世纪 90 年代培养出来的博士，均出自荣鸿曾的门下。现为美国艾莫瑞（Emory）大学音乐系副教授的李忠顺以研究海外华人间的中国戏曲为其专长，除出版过《新加坡的中国街头戏曲》（伊利诺伊斯大学出版社，2009）外，还在《亚洲戏剧》等学刊上发表过论文。巴然诺维齐现任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高级讲师。他虽以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为主，但他的论著大都不聚焦音乐形态，而是关注音乐外的问题，更多地涉及中国的民族政策、种族认同、性别、性、文化政治等问题。他除了专著《中国新声：流行音乐、种族、性别、政治，1978-1997》（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外，还在英、美主流中国学术研究刊物（如《现代中国》、《中国学刊》、《亚洲学刊》、《中国季刊》等）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除匹大师友之外，《中国音乐人生》的作者还包括目前活跃于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界的一些欧洲和澳大利亚人士。现为英国舍菲尔德（Sheffidld）大学音乐系教授的施祥生除了《阿炳的音乐及其意义》（1996）外，以前的研究也曾涉及到上海 30 年代的流行音乐，他的《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2003）也有中文译本。荷兰人高文厚是《磬》的编辑之一，他多年来推崇中国音乐，用英文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音乐的访谈、评论和报道。他的太太施聂姐是最早研究吴歌的外籍人士之一，她于 1997 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就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民族音乐学高级讲师的哈里斯以研究新疆维吾尔族音乐文化见长，和巴然诺维齐一样，她研究的切入点虽然是新疆及中亚的木卡姆，但她所感兴趣的问题却远不局限于木卡姆音乐本身。城乡隔阂、种族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地位、表演艺术对 20 世纪现代化趋向的调适、音乐的宣传与商业性运用等问题都在她的视野之内。曾在“音研所”工作过的澳大利亚人米思奇做博士论文时写的是学堂乐歌，但他对流行音乐也有一定的兴趣，在北京工作期间又对杨荫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学者除注重理论研究、都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力求成为唱奏兼佳的学者，而不仅仅满意于“纸上谈兵”。

《中国音乐人生》集中所收的论文虽以“个人”为本，但所涉及的内容广泛，研究切入

点也不尽相同。除黄翔鹏先生在《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载《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一文中所说的"民俗型"(卢墟山歌)、"乐种—雅集型"(古琴)、"剧场型"(改良后的沪剧)、"音乐会型"(腾格尔演唱的蒙古族民歌)的传统音乐外,还包括国内音乐学界不太瞩目的流行音乐。和所有类似的出版物一样,面对如此多的选择,读者只能依照其研究兴趣做出定评。我本人觉得最受益的是李海伦的《引言》、荣鸿曾的《蔡德允诗、书、乐百年人生》、米思奇的《采集一个民族的音乐:杨荫浏的人生缩影》、巴然诺维齐的《一个"国家艺术家"的顺从、自主、抵御:中国蒙古族音乐家腾格尔个案研究》。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教授的李海伦对国人来说不应该是个陌生的名字。她毕业于牛津大学中文系,80年代中期在上海音乐学院留学,后赴匹兹堡大学随荣鸿曾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的专著《历史的回声:现代中国的纳西音乐》200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一直深受好评。除了纳西音乐外,李海伦对方法论、民族音乐学研究历史、传统与民间音乐的知识产权等问题也很关注,她和荣鸿曾合编的《理解音乐学先驱查尔斯·西格》(美国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99)也已成为美国多所大学音乐学系学生的参考书目。此外,李海伦也是最早认识到传记研究重要性的民族音乐学家之一,早在2001年她就发表了《和毅庵音乐人生九十年:传记、历史与中国西南之经历》的论文(载《音乐的世界》43: 1:43—67)。她编辑《中国音乐人生》可谓匠心独具,其所收的论文看似零散,但充分体现了她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重性问题的关注。这里她把7篇文章按照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地方性和区域性为焦点,聚焦长江三角洲的民歌手和上海开埠后新兴起的沪剧;第二部分转而以文人为主轴,讨论琴家蔡德允和史家杨荫浏;第三部分不仅把读者的眼界拓宽到汉族文化圈以外的新疆和内蒙古,还把读者的视线引到中国版图外的英国。值得一提的是,李海伦本来也为此书写有论文,但是由于出版费用的问题,她无私地撤下了自己的文章。在此书的《引言》中,李海伦对书中的7篇文章除有概要的综述外,还就当前音乐学界的一些成就、不足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予以简要的概括。她的这一做法不但为书中的多样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共同的语境,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书中论文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仔细看一下《引言》后所提供的近5页的"参考书目",细心的读者不仅会发现国外近年来几乎所有有关个人与音乐文化的论著条目,还可以看出李海伦对国内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关注。多年来由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等问题,国外大多数学者不太愿意引述国内的研究成果,他们感兴趣的是资料性的文献集。但与他们不一样,李海伦对国内的一些研究不仅关注而且有所汲取。也正因为如此,她和钟思第有时还会被同行诟病,如Carole Pegg 2001年发表在《英国民族音乐学刊》(10:1:117—124)上的评《历史的回声:现代中国的纳西音乐》的文章和施祥生在《沪剧》最后一章中对钟思第所谓东方主义研究方式的指责。

现为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音乐学教授的荣鸿曾是大家都已熟悉的重量级的学者。有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和哈佛大学音乐博士的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民族音乐学研究,他的研究兴趣除粤剧、古琴、南音、木鱼外,还涉及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音乐形态分析、样板戏、中国礼仪音乐研究等多个领域。1996年他与清史专家罗思基(Evelyn S. Rawski)和人类学家华若璧(Rubie S. Watson)主编的论文集《和声与对位:中国

语境中的仪式音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代表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仪式文化的最高成就，已成为研究中国仪式和仪式音乐的必读书。在海外的中国音乐学者中，荣氏和同为赵如兰学生的林萃青一直在倡导音乐学者应打破学科疆界，应把音乐学研究融入到广泛的人文研究中去。他俩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在音乐学以外的其他一流的人文和社会学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除自己的研究外，荣氏还培养了一批颇有成就的学生，目前活跃在北美和香港的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如在香港中大音乐系任教的陈守仁，现为马里兰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的韦慈朋，今香港演艺学院中国音乐高级讲师白得云先生以及香港音乐事务署中国音乐高级主任徐英辉等）大都出自他的门下。近年来，荣氏的研究也包括文化政策、知识产权和口述历史。关于荣氏的学术成就及教书育人，余少华在《自现代物理到现代音乐学》(载香港中文大学 2010 年 3 月号《新亚生活》37: 7: 2）一文中有简要的介绍。在《中国音乐人生》一书中，荣氏用不到 30 页的篇幅，以极其个人化的笔触对其古琴老师蔡德允的人生、诗作、德行与琴艺进行了非常感人的叙述。通过对蔡德允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物近距离的观察，荣氏成功地描述了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即将逝去的世界。蔡德允的独特不仅仅体现在她是游弋于男人世界中的女琴家，也不完全取决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而是她举手投足间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她受中西文化教育却对中国古琴和书法情有独钟，生逢乱世却能坦然处之，身居闹市却能维持自己的一片绿洲，在极端商业化的香港却能淡泊明志，拒绝谈钱，在西乐鳌头独占的年代却能矢志不渝地维持中国文人的“雅集”传统。关于蔡德允，丁承运在 1999 年提交给“20 世纪与中国音乐学——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似曾简略提到过，但也只是列举了她的古琴教学及其相关的文化传承。荣鸿曾自 1978 年即随蔡德允学琴，私交甚笃，直到她 2007 年 6 月去世。荣氏的文章除了有助于读者了解蔡本人外，对香港的古琴界也极有帮助。此文为荣氏英文《中国文人绝世遗芳：蔡德允其乐、其诗、其人》一书(香港大学出版社，2008)的缩微版。

由于杨荫浏在 20 世纪中国音乐研究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海内外关于杨荫浏的著述早在杨先生去世不久就开始出现。如韩国鐄 1980 年 9 月发表在美国《民族音乐学》上的杨荫浏、阴法鲁、李纯一人生小档案和有关著述目录；赵如兰、周文中、张充和、傅汉思、库特纳、展艾伦、李伯曼、荣鸿曾等十六人在 1984 年杨去世后在《民族音乐学》上所刊发的纪念文章；林萃青 1995 年发表的论文《中国音乐学研究：从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到儒家典籍》、郑苏、钟思第在荷兰《磬》学刊上对 1999 年“20 世纪与中国音乐学——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等。钟思第 1997 年发表在《英国民族音乐学论坛》上的评施祥生《阿炳》一书的评论文章也多涉及到杨荫浏。国内近年来有关杨先生的专题研究时有出现，研究资料也臻于完善(如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 13 卷本《杨荫浏全集》)。但现有研究也有些不足，对杨先生的英文论著的瞩目不够、对中文以外的档案资料利用不足、对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欠熟悉就是突出的例子。如盛宣恩先生早在 1964 年提交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就有相当的篇幅分析杨荫浏在中国圣诗编纂工作中所做的工作，但无论是纵览杨先生一生成就的硕士论文（见周颐《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8)还是专门研究杨荫浏与《普天颂赞》的博士论文(见

林苗《中国新教赞美诗集〈普天颂赞〉之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也只是参考了盛宣恩后来刊载在《香港浸会圣乐季刊》上的中文论著《中国基督教圣诗史论述》,未能充分利用盛先生的博士论文。而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米思奇的研究却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米思奇的论文成稿于2004年,文中不仅参考了当时可以见到的杨先生的中文著述及国内外有关杨先生的各类研究论著,对杨先生1921年与美国小提琴家、指挥兼作曲家亨利·爱希汉(Henry Eichheim,1870–1942)的短暂交往(遗憾的是,米思奇似乎没有意识到爱希汉1900–1930年的档案资料现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图书馆的特藏部,所以没有用到这些珍贵的史料)、历年发表的英文著述(如杨先生1934年和1984年分别发表在《教务杂志》和《中国音乐》上的文章)、英文报刊中有关杨荫浏的文献资料以及杨荫浏与费佩德(Robert F. Fitch)、范天祥(Bliss Wiant, 1895–1975)一起进行的一些项目也进行了初步的叙述。更重要的是,米思奇为学者日后研究杨先生与其干娘美国传教士郝路义(Louise Strong Hammand, 1887–1941?)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他文中提到芝加哥纽伯瑞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收藏有郝路义1912–1943年间写给其姊尤妮斯·娣简丝(Eunice Tietjens, 1884–1944)的私人信件。但米思奇好像没有意识到娣简丝就是郝路义的大姐。娣简丝婚前名为Eunice Strong Hammond,婚后随夫姓Tietjens,虽然她后来又结过婚,但没有再改姓。娣简丝是美国颇有名气的意象派诗人兼儿童文学作家,上世纪60年代就有专门研究她生平及创作的博士论文出现(见W. N. S. Love, "Eunice Tietjen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60),1995年版的《牛津美国文学词典》中也有关于她的条目。有意思的是,娣简丝不仅上个世纪20年代曾来过中国,在无锡住过一段时间,写有诗集《中国侧影》(Profiles from China,1917),与闻一多还有过交往,对闻一多的诗作有不小的影响(可参见卢惠余《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载2009年9月《河南社会科学》17:5:135)。国内外有关娣简丝对闻一多影响的研究不少,但似乎没人知道她就是郝路义的姐姐。也很少有人提到她们姊妹俩曾在1931年初有一本中国游记的故事书(Burton Holmes Travel Stories: China,此书有多种版本)。纽伯瑞图书馆特藏部所藏的24箱与娣简丝有关的卷宗中,米思奇说有"26个文件档"与郝路义有关,其中一个文件档是"中国歌曲"(内有十篇文献,有词曲),一个文件档是"中国照片",其他24个文件档是郝路义与娣简丝的信件。米思奇还提到郝路义在信件中多次自豪地提起杨荫浏,在一封1939年6月寄自昆明的信中,郝路义甚至把她"发现杨荫浏"称作她"对中国教会最大的贡献"(第99、107页,注7)。米思奇的论文还有一个与国内作者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他行文比较客观,情感性的色彩不多,具有批评的观点,不似国内的类似著述,多是为传主"树碑立传",以褒为主,好话多(冯文慈先生的有关文章除外)。其原因除西方人作传的手法不同外,还有一点是米思奇本人从未见过杨荫浏,更未曾有过当杨先生弟子的殊荣,有通常所谓的距离感。施祥生在其《阿炳的音乐及其意义》一书中就杨荫浏与阿炳神话之创造也有令人深思的讨论。因为杨先生的档案资料和日记还没有公开,他无法对杨先生学术外的生活展开讨论,但他还是不忘提醒学者关注在杨先生生活和事业中扮演过重大角色的人物。如文中未讨论,但在尾注①中提到的曹安和与杨荫浏的关系。曹安和在杨先生生活及事

业上的重要性是学界所共知的，但有关的研究却还没有见到。但是米思奇论文中的错误也不少。承蒙作者不弃,笔者于 2004 年在北京见到米思奇时曾读到此文的初稿，当时就发现其中的疏误很多。出版时虽经编者尽量铲除,但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除拼法错误外（如把“国乐观”、“世纪”分别错拼为“guoyue gua”、“shijie”、把“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牺牲的“顾正红”错拼为“Gu Zhengzhong”),翻译也有不甚准确的地方,如 91 页把“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揭示其规律性”译为“We have so far not expended enough of our energies to reveal the basic regularities”等。还有一些史实性的错误,如把库特纳(Fritz A. Kuttner, 1903-1991)说成是杨先生在圣约翰上学时的老师(97 页),把施通普夫(Carl Stumpf, 1848-1936)说成是王光祈的老师等。杨荫浏 1923 年入圣约翰大学,而库特纳是在纳粹分子控制德国后的 1939 年 5 月才流落到上海的。做过一段杂工后,库才于 1944 年春被圣约翰大学聘为音乐客座教授。他怎么可能是杨先生的老师?王光祈曾师从过柏林比较音乐学派的霍恩博斯特尔等人,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是施通普夫的学生。

欧美学者多年来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乐论、音律、古琴、筝、昆曲等这些传统中国高文化的课题。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国外民族音乐学科的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音乐、汉族民间音乐、中国民间器乐传统等感兴趣。但截止到最近几年,关于音乐家自身的研究还不多见。李海伦编的《中国音乐人生》无疑对填补这一空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新西兰国立 UNITEC 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

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结束

由本刊参与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日前圆满落幕。本届征集活动从启动到结束历时一年,得到全国各地高校师生的踊跃投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四十多所高校的来稿 124 篇,经过初筛、复评与终评三个阶段,产生了获奖论文 28 篇。

“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旨在挖掘、鼓励音乐传播研究的新生力量,以推进音乐传播学科的发展为己任。音乐传播研究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中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学术领域。目前,与音乐传播相关的专业教育正蓬勃发展,相关专业和方向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高校中设立,进行专业教学的探索和完善,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传媒音乐、音乐文化管理与产业发展对实践人才和研究人才的需求;音乐学各传统分支学科也在进行研究视角的转换,以适应当前现代传媒语境下的社会音乐和文化发展趋势,客观上也参与到了音乐传播研究当中来;传播、经济类等其他学科,亦在用其各自的学科视角,对渗透到了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音乐传播现象予以正视和观察。音乐传播研究,是一个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的学术领域。

本届活动获奖论文的作者大部分是近年来从事音乐传播研究的青年学术力量,展现出了青年人的学术活力和音乐传播教育的新成果,也激励了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音乐传播研究这项工作中来。获奖的作者多数来自音乐学领域,亦有少部分来自传播学、传媒经济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相关专业领域,体现出了音乐传播研究的交叉性与开放性。(韦　杰)